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 李自修 译

Frederic Jameson

MARXISM AND FORM

Twentieth - Century Dialectical Theories of Literature

——根据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年第一版平装本

译出

责任校对:许 洁
责任印制:宗 勇

语言的牢笼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Yu'Yan De Lao Long

Ma Ke Si Zhu Yi Yu Xing Shi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新魏路17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宜黄县印刷厂印刷

字数 38.5 万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8.25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80579-931-8/I·762 定价:22.30 元(平)

向精神求索开放的只有两条途径，
我们的需要在那里分道扬镳，
一条是美学，政治经济学是另一条。

——马拉美^①

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
唯物主义。

——列宁^②

① 原文系法语，载《马拉美全集》，加利玛出版社，1951。——译注。

② 译文转引自《列宁全集·哲学笔记》，第38卷，第305页，人民出版社。——译注

序 言

当美国读者想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时，我认为，浮现在他们脑海的仍然是本世纪三十年代的那种氛围。在那些岁月里，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反纳粹主义、人民阵线、文学和劳工运动的关系，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以及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这些问题引发了我们可以抱着怀旧心情进行反思的辩论，但这些辩论已不再符合今日世界的情况。那时所从事的批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具有一种相对来说是非理论的、本质上是训诫的性质，与其说适用于研究生的课堂讨论，毋宁说它注定更加适用于夜校的教学；它已经降低到思想和历史古董的地位，作为这种古董，它偶尔零散地重印普列汉诺夫的论文，或者偶尔参考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至今仍然被保存下来。

然而，近年来一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已经在英语世界出现。这可以称作不同于苏联传统的、一种相对来说是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这种批评在德语国家可以回溯到卢卡契于1923年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和重新发现的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引起的理论激动时期；而在法国，则可以很容易确定它出现于三十年代末黑格尔在那里的复苏时期。

下面各章，作为对这种马克思主义及其某些主要理论家的粗略介绍，倘或有用的话，我将非常欣慰。我尽量充分阐述它的一些关键性论著，如卢卡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小说理论》，布洛赫

的《希望原则》，本雅明的《德国悲苦剧的起源》，阿尔多诺的《新音乐哲学》和《否定辩证法》，以及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等，因为这些论著对于英语读者来说，有的根本无法读到，有的很少在美国讨论过。

不过，即使是这样一个比较朴实的、直截了当的任务，就其本身看，仍然是一个完整的项目。其中一个原因是，连诸如萨特或卢卡契之类的较为知名的作者，也由于他们评述者的反共偏见，或者干脆由于在学术领域内缺乏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素养，从未在英语世界得到清晰的了解。

也许更不易察觉的是，任何人在介绍德、法辩证法文献时，都在某种程度上或明或暗地被迫考虑第三民族的传统。我指的是我们自己的传统，即政治自由主义、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那种混合，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英美哲学，它在各个方面都与我们此处所勾勒的思维类型相敌对。不考虑这种颇具影响的概念的对立，就无法为在这种传统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读者写作，甚至无法与作者自己的历史构成达成一致。倘若你愿意这样理解的话，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我这本书的某些部分的倾向性，赋予它一种可说是政治和哲学上的锐利锋芒。因为这种自由主义传统的破产，虽说在哲学层面上与在政治层面上同样显而易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失去了声誉或意识形态上的潜力。相反，这种传统的反思辩偏见，它对个别事实或事件的强调，是以牺牲该事件可能寓于其内的诸关系的阿谀为代价的，它继续鼓励对现存秩序的屈从，阻挠其追随者在政治上进行联想，特别阻挠他们得出本来是不可避免的结论。因此，对处于英美传统影响范围之内的人们这些人来说，学会辩证的思维，掌握辩证文化的基本原理，以及它所提供的基本批评武器，已是当务之急。这本书如能对于这一发展稍有裨益，我也庶几感到满意了。

然而，本书并非哲学，而是文学批评，或者起码是对文学批评的一种准备。马克思对于个别艺术作品的强调，以及它们对他所具有的价值（正如在他之前它们对黑格尔以及在他之后它们对列宁所具有的价值一样），远远不是个人的人格问题；从某个方面说，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进行更加精确的鉴定。文学在辩证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对这个问题，我还可以补充一点：文学这个封闭的领域，它所构成的试验的或实验室的境况，连同其形式和内容以及上层建筑同基础结构之间关系的特殊问题，提供了一个在其中观察辩证思维发生作用的特殊的微观世界。

与此同时，下而各章如果不能体现专门性哲学研究的严谨，那么它们作为语言的地位将仍然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它们也远非对一个作者的种种立场和重要观念所作的简单化的、介绍性的略述，或者报道式的概览，远非对他以及同他时代诸问题关系的趣闻轶事式的缕述。倒不是因为这些事情不使人感到兴趣，或者毫无用处，但在我看来，它们仍然停留在仅仅是见解的层而上，亦即从外部把握理性的态度。我认为，只有通过细节的具体把握，只有通过一种体系依照其内在必然性所进行的逐步建构进行同情的、内在的体验，才能获得这种辩证方法。我并没有在介绍过程中，试图“调和”这些形形色色的建构；但在最后一章，我试图从总体上去描述这种辩证思维过程，以及它涉及具体文学作品时所采用的一些方式。

我应该说明一下论述德国和法国章节时的不同着重点。从非辩证的英美传统角度看，两种思维方式同样令人鼓舞，同样开拓思路，但其方式有所不同。值得指出的是，在德国，辩证思维如果不是唯一正式的，也曾经始终是一种正式的哲学传统。只是到了最近，在经过了希特勒时代的长期黑暗之后，阿多诺战胜海德格尔式的存在哲学，才标志着具有这种传统的诸学派的再次崛起。

我认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因为在德国，辩证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它自己的名义说话的——我才环绕着话语自身的标志，安排了本书各章。因为，正如在黑格尔论著中已经作过的那样，在各章所讨论的著作中，辩论思想不是别的，而恰恰是辩证语句的精心发挥。为了稍稍表达对作为逻各斯的现实运动的这种观念的感受，我采用了语言修辞本身的术语，如转义和修辞，其中将辩证思维的运作视为一种过程或修辞格；或者说采用了一种对于经验的存在或破译的术语，这可以认为是对一个文本的诠释学的评注。

无疑，现在是对文体（风格）稍加论述的时刻了；对于本身作为一种方法的文体（风格）学，无论我有什么保留，我仍然忠于这样一种观念：对一种文学或哲学现象所作的任何具体描述——假如它当真需要面面俱到的话——都有与单个语句本身形态达成一致的最终义务，都有阐明它们的起源和构成的最终义务。在本书各章中，我在这一方面常常没有进行深入探讨。

不过，英美传统对辩证传统的敌视，无论在哪里都不如在以下这种广泛传播的观念中，表现得更加一目了然，即认为这些著作文体晦涩、滞重、佶屈、抽象，或者用方便的时髦说法，一言以蔽之，是日尔曼式的。可以承认，这种文体与在学校规定教授的那种清晰流畅的、新闻报道式的作品并不一致。然而，就我们目前的论题而言，如果那些简练的理想是为一种和笛卡尔心目中那种目的极其不同的意识形态目的而服务，那么后果会怎样呢？在这个印刷品生产过剩和速读法急剧增殖的时代，这些理想如果是用以使读者能够迅速读完一个语句，以便使他顺便地、毫不费力地掠过一种现成的观念，面不曾想到，真正的思想必定要求他深入语言的物质性，而且在语句的形式上要求与时代本身保持一致，那么后果又将怎样呢？在阿多诺的语言中——也许在他们中间，他有最优秀的辩证法的智力，是最出色的文体家——不透明性本身就是一种不妥协的行

为，驳然杂陈的抽象措词和相互参见，用意恰恰是要求在一反其周围簇拥着廉价的易读东西的环境下进行阅读，告诫读者进行真正的思考必须付出代价。这种文体的绝对抽象性，是越过个别经验现象达及其意蕴所必需的；抽象术语紧紧依靠它的客体，标志后者本身的不完整性，标志它在总体性的语境中必需加以替代。我无法想象，凡是对现实的辩证性质稍有感受的人，有谁对这种语句中的纯形式愉悦无动于衷？在这些语句中，世界的改变，以及表面没有联系又相距甚远的范畴和客体之间的出乎意料的接触，突然找到了戏剧性的阐述。我想强调说明，这并不是一个鉴赏力的问题，正如辩证思维的有效性不是一个见解问题一样；然而同样肯定的是，对任何人想用这些术语来讨论这个问题的人，也不存在任何答案。

当我们现在转向法国传统的时候，可以立即明显地看出，它具有更加具体的特征。法国确实变成了现象学的哲学基地，并且由于拉康的缘故变成了弗洛伊德主义以及实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地。因为法国的情况是这样的：在这里，正如精神分析学一样，辩证思维从来不是一种正式的哲学，因而不得不借助对其他哲学和其他学科的隐蔽影响来表现自己，例如以课程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形式，抑或通过方才提及的黑格尔复苏的方式等。因此，列维-斯特劳斯公开声称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同时，萨特式存在主义的巨大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它在黑格尔身上发现的那些原理，而不应归因于克尔凯郭尔或者海德格尔原理，则是无法计算的。

然而，《批判》（指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译者）一书，从本质上讲是一部政治科学著作，在一本专门论述文学批评的著作中，花这么长的篇幅讨论这部著作似乎显得自相矛盾。诚然，在论及辩证思维的情况下，无法把政治因素同意识形态因素抑或文化因素截然分开；况且，萨特的这部著作也有它的长处，它使我们能够直接讨论阶级、经济基础和历史的现实，而这些在论述德国的各章里

只是以预想的方式提出来的。然而从本质上说，萨特这本书对于辩证文学批评的价值，在于它提出对于任何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都至关重要的调停这个问题的方式。换句话说，我们如何从社会生活的一个层面过渡到另一个层面？如何从心理的层面过渡到社会的层面？以及的确还有如何从社会的层面过渡到经济的层面？意识形态，姑且不说艺术作品本身，与冲突着的群体之更基本的社会和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怎样？如果把文化客体视为既是伪装的又是透明的社会行为，那么对这种现实又应该如何理解？因此，萨特的巨著为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诠释学提供了技巧。我们在最后一章将对这种技巧进行系统阐释。在该章里，用德里达的话说，我们是对一种辩证文学的基本模式进行“分解”并演示出它的种种功能。

对于一种马克思主义立场，试图稍微确切地确定它们某些方法论和含义，也势必遭到各种各样的反对。如果象利希海姆所认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既是德国的又是历史的，也就是说，它作为一种活生生的不断发展的哲学，已经成为过去而告一终结，那么，我们此刻在这里所微的就必然是别的什么东西。不过，从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角度看，本书所论及的作者，则已囊括从新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道地的修正主义和存在主义，一直到极端左倾主义和超布尔什维克主义了（梅洛—庞蒂描述后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萨特语）。我个人所理解的修正主义，是通过排除一切需要的实践或变化，一切可能引起痛苦的因素，以便适应于中产阶级公众的纯思考的智力消费，而使一种理论变得轻松惬意的行为。由是，对弗洛伊德的修正，便悄悄地抑制了我们称之为他的唯物主义基础的因素，即坚持个性失调中的明显的性病因学。自伯恩斯坦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同样包含着对作为实利主义基础的阶级斗争观念的排除，对于本书中的这样一些倾向，读者显然有必要作出自

己的判断。

不过，为什么读者应该花这么长的篇幅，来熟悉那种久远、复杂而又令人生畏的技巧体系，即黑格尔哲学，他有权要求得到更圆满的解释。在本书中，我所持的立场是：马克思实际上包括了黑格尔，但同时我也能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复杂的概念特征，似乎同文学批评的日常运用并不成比例，与个人文本自身也不成比例。不过，这是错误地判断了文学批评本身在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作用。

由于早期马克思主义批评修辞学强调历史的演化，强调资本主义体制出现于更早的封建和部落社会组织形态，我们就可以把它描述为遗传学的。戈登·蔡尔德的著作在英国史纂学中，提供了这种方法的熟悉而又典型的例证，在文学批评领域内，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和恩斯特·费希尔的著述，以及卢卡契的《美学》，则完全可以视为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同一基本策略所作的说明。当艺术的成长脱离了仪式和宗教，并且首先逐渐把自身确立为独立的、特殊化的技巧总体，最后确立为现代时期的一种事业或者反事业时，这种策略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于艺术自身的初期分化过程。在它实际上所关注的人类学事实之上和之外，这样一种方法在意识形态上的效果，是重新安排我们对历史存在的认识，重新构建我们对现代社会所抱的幻象，以便使我们能够在文学和艺术的现在之个体主义的后面，区分出较早的集体艺术实践的形态。历史演化的观念，因而本质上是对我们思想进行新的政治化的一种形式或借口，它通过让我们窥见过去的更加健康的具备社会功能的艺术，使我们了解我们未来可以取得什么样的社会改革和更新。

然而，现代西方文化不再有助于这样一种有争议的重构了。首先，我怀疑是否有许多人认为，在我们的艺术成在我们的社会自身之内——至少在今日美国所达到的这种极端中——还存在着许多值得用这种方式挽救的东西；其次，这种论证所依凭的现在同历史

的和史前的过去之间的连续性，似乎已经确凿地被后工业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组织的新方式打得粉碎。三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所必须面临的现实，是不复存在的较为单纯的欧美大陆的现实。这种世界同前几个世纪的生活形态，比起同我们自己的生活形态来，具有更多的共通之处。说它较为单纯，并不是认为它是更自然的现实。相反！那是一个社会冲突更尖锐面更加一目了然的世界，不论在单个的民族国家之内还是在国际舞台上，都投射出各个阶级相互对立的一种明确的模式——这种模式象人民阵线或西班牙内战那样明显，它要求人民要么同意要么死亡，尽管这毕竟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正是这种阶级模式的可见性和连续性（这包括家庭内和大街上的日常经验，一直到总动员本身在内），今天已不复存在。它的消失自然是一种相对的和民族的问题。因此，法国保留着政治经济动荡的、德国早已丧失了的一种阶级性质，在本书所讨论的著作中的各自侧重面上，清晰地反映了出来。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尤其在美、后工业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自冷战开始以来传播媒介所运用的神秘化技巧，特别是急剧扩张的广告宣传所运用的技巧，同时也带来了阶级结构的进一步隐匿消失。用存在主义的术语说，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经验再也不是完整的了，我们再也不能在对个人生活的关注之间找出任何觉察得到的联系，面为个人生活是在丰裕社会的壁垒和禁锢之内，新殖民主义、压迫和反暴战争在外部世界对体系的结构性的投射之内，按照自己的轨迹运行的。利用心理学术语，我们可以说，作为服务性经济，我们因而远远摆脱了这个世界上生产和劳动的现实，以至于居住在一个由人工刺激和电视传播的经验所构成的梦幻世界里。在以往的任何文明中，重大的形而上学的关注，存在和生命含义的基本问题，从来没有显得这么极为模糊和不切题旨。

在美国本土内,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其意识形态在各个层面上的神秘化,任何策略的或政治的问题都首先是理论的问题,任何行动方式无不同虚假不实的文化本身的混乱难分难解的纠缠在一起。问题不在于街头反抗者或者城市游击队能否战胜这个现代国家的武器和技术,确切地说,问题是在这个超级大国中究竟这条街道在哪里,事实上,在这个由广告和自动生产所构成的新国家中,首要的是这样的旧式街道是否仍然存在。这些就是今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至少在被称之为过度发展的国家中是这样的。

在今天的世界上,应该存在着几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这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同思想反映其具体社会情况的原则完全一致,其中每一种马克思主义都满足了其自身社会、经济体系的特定需要和问题;例如,一种符合社会主义集团中革命后的工业国家;另一种,即农民马克思主义的那种类型,符合中国^①和古巴以及第三世界国家,还有一种试图从理论上解答由西方垄断资本主义所提出的独特的问题。正是在涉及这最后一种,我愿称之为后工业化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黑格尔哲学的重大主题: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具体与抽象的对立、总体性的概念、表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等等,又一次提上议事日程。一种既想或为描述性的又想成为诊断性的文学批评,只有重新创造它们,才能对它们置之不顾。

1971年3月

于拉荷耶

^① 本书作者,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解释,而对我国则缺乏研究,很不理解。因此,这里的论点近于臆测,因而是不符合实际的。——编者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泰·维·阿多诺或历史的转义.....	1
I	8
II	14
III	30
IV	39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诠释学的变体	48
I 瓦尔特·本雅明或怀旧	48
II 马尔库塞和席勒(1).....	69
马尔库塞和席勒(2).....	89
III 恩斯特·布洛赫和未未	97
第三章 关于格奥尔格·卢卡契.....	136
I	137
II	154
III	161
第四章 萨特和历史	
I	177
II	194
III	207
IV	233

V	239
第五章	走向辩证批评	
I	黑格尔式文学批评;历时性建构	262
II	文学范畴;内容的逻辑	276
III	作为形式与内容中介的固义反复	287
IV	唯心主义、现实主义、唯物主义	303
V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重新为作品奠定基础 ...	317
VI	马克思主义与内部形式	340
	参考书目(略)	
	译后记	354
	本书术语英汉对照表	359

第一章

泰·维·阿多诺或 历史的转义

如果一个作者的基本主题是公众的消失，那么能把 he 介绍给什么人呢？如果一部著作固执地坚持现代艺术和思想应该艰深，应该维护它们的真理和新奇，因此严格要求其参与者集中全力，并在力图重新唤醒麻木思想和迟钝感觉的同时，否认对一个新的、全然陌生的真实世界的一切习惯性反应，那么人们能举出什么严肃理由来证明把这样一部著作加以概括和简化，并使之得到广泛理解的尝试是正当的呢？

在泰·维·阿多诺的毕生事业中，似乎一切都是为激起并加剧它所谴责的那种社会—经济现象：劳动分工，知识能量分裂成一批看上去各不相关的专门化学科。因此，对阿多诺关于现代文化的批判，即我们能拥有的一种最彻底、最悲观的批判，便无法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顺便进行考察。实际上，由于某些原因（这些原因我们在后面会充分理解），把这种批判当作一个带有一般性质的独立命题也是办不到的，因为它同阿多诺关于自己种种偏好中的专门特性的详细论述是一致的。这些偏好包括：职业哲学家，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黑格尔式的批评家；音乐作曲家和理论家，托马斯·曼撰写《浮士德博士》时的“音乐顾问”；偶一为之而又终其一生的文学批评家；最后还有实践型的社会学家——其中，既有在里程碑式的《权力主义人格》中对反犹太主义的先驱性研究，又有对“文化工

业”(阿多诺语)和所谓大众音乐的剖析。

然而,这些种种不同的研究领域,虽然都有各自的结构和法则,各自的独立传统和专门术语,虽然都会被视为我们与意识形态一词相联系的某种超越的不同于副现象或伪意识的东西,但它们作为在文化领域中飘浮不定的客体,又都是一种不稳定的存在,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

对于哲学体系和音乐风格,这些与19世纪小说同样轰动一时的文化现象,阿多诺的论述清楚地说明,它们应该放在马克思主义称之为“上层建筑”的语境中来理解。于是这种思想在尊重客体作为独立实体的完整性的同时,也承认应该超越专门化分析的界限。它在其结构内部,事先假定了从内在到外在、从个别事实或作品到它背后的某种较大社会—经济现实的运动。换句话说,上层建筑这个术语,已经在它自身内部带有对立而,一种作为含蓄对比的,并通过自身的建构,把同社会—经济基础或者基础结构的关系问题,当成它作为一种思想的完整性的先决条件。

所以我想说,文化社会学首先是一种形式,不论用什么哲学假定来证实它,作为实践,作为一种概念运作,它总包含着两极之间一种火花的跳跃,包含着两种不平等的条件或两种表而不相关的存在方式的接触。因此,在文学批评领域内,社会学方法必然把个别艺术作品同某种更大的社会现实形态并列起来。这种社会现实形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视为艺术作品的源泉或本体论的根据,被视为它的格式塔场,而作品本身则被认为是对这种形态的一种反映或一种征象,一种典型表现或一种简单的副产品,一种进入意识或想象或象征性的解决。对于这个有争议的中心关系的构想方式,姑且只举上述几种。

十分明显,文学的社会学源于浪漫主义时期,伴随着历史本身的发明而出现,因为它依赖于对文化领域统一性的某种先在的理

论化；不论后者是以政治制度（如有别于独裁或共和社会的君主立宪社会的性质）、历史时期（如古典、中世纪、现代—浪漫主义时期）、民族特性（英国、法国或者德国气质）的体制化语言来考虑，还是人的文化存在或社会—经济境况（如后工业、工业化和不发达的境况）等更近的语言来考虑。当然，最初对于艺术的这类思想，这种在鉴赏领域内刚刚出现的历史性，既属于左派也属于右派，因为它存在的起源寓于革命时期本身的骚动之中。夏多布里昂之类的保皇党人和斯达尔夫人一样，都深切地意识到文化的相对性和人类经验的历史性。斯达尔夫人的《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1800）一书，可以列为维柯和孟德斯鸠之后第一部充分阐述这个命题的论著。诚然，在本书的后面，我们必然要考虑如何区分以浪漫派为其先祖之一的社会学的、“自由评价”的文学分析方法，和这里将详细阐述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分析形式的问题。

然而，一旦取得了某种这样的文化统一性的观念，社会学运作的两种基本因素——作品和背景，——便开始以辩证的方式互相作用，事实上几乎是以化学的方式互相作用，而这一纯属相互关系的事实，先于后来形成的对它进行解释的任何概念范畴，如因果、反映或类比等。因此，这样一些范畴可以视为初始模式的种种逻辑取代或混合，或者视为将初始模式有机地纳入其中的那种格式塔的交替出现的、看得见的种种可能；即多种思想企图，它们在事实之后，试图说明这样两种全异的情况何以能归入单一的思维框架之内。

在这个语境中，根据社会存在或者根据“种族、时代、环境”的决定论这一令人烦恼的问题，便有可能置于括弧之中，而那些看上去与马克思主义和韦伯派相左的问题，却原来是视觉的幻象。因为从这一观点出发，马克思主义对一种现象的分析，例如对清教主义的分析——即认为它是早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一，或者换句